

明代内阁首辅王锡爵与万历朝鲜战争

范敬如, 陈尚胜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明史·王锡爵传》中对于王锡爵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具体行迹只字未提。那么,当战争发生时,作为内阁首辅的王锡爵是否参与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通过对援朝御倭文献中王锡爵行迹的考察,可以发现他在援救朝鲜决策、保护前线将帅并疏导二人之间矛盾、确定明日议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均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关于朝鲜御倭事务、北边事务等方面,王锡爵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深刻认识。

[关键词] 万历皇帝;王锡爵;援朝御倭;宋应昌;李如松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23)05-0049-10

明代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是因为日本侵略朝鲜而明朝出兵援救的一场东亚国际战争。参与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明朝君臣的决策行为至关重要。学界对万历皇帝和相关官员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已多有论及^①。然而,作为时任内阁首辅的王锡爵^②,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却鲜有人问津。或许,这与清代官修《明史·王锡爵传》中对于传主在万历朝鲜战争中具体行迹只字未提相关。可是,从明朝政治制度来看,明初洪武帝取消中书省而政归六部,后来皇帝不得不设内阁大学士而参预机务。“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③文中“纶言”,指皇帝诏书、制令,即内阁学士要为皇帝撰写诏书、制令;而所谓“票拟”,又称“拟旨”,指内阁学士对于各部府院等衙门及臣僚呈送皇帝的章奏等文,要代拟处理意见,以备皇帝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23)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范敬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尚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解扬:《万历封贡之败与君臣关系的恶化——以吕坤(1536-1618)万历二十五年被迫致仕为线索》,《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朱法武:《论明神宗与援朝御倭战争》,《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刘香儒:《万历援朝东征时期的庙堂策划》,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孙卫国:《兵部尚书石星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等编:《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4辑,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106页;孙卫国:《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范敬如:《明朝首辅赵志皋与万历明日和议》,《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②王锡爵(1534-1611),字元驭,江苏太仓人。万历十三年(1585)入阁辅政。万历二十年(1592)朝鲜战争爆发之际,王锡爵正在家中省亲,被万历皇帝任为首辅急召回京,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到达北京。如果以他回京任事计算,王锡爵正式任首辅时间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三十日。

^③《明史》卷109《宰辅年表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05页。

裁决。由此可见,内阁首辅在明代政治活动中处于领衔辅政、沟通君臣的中枢地位^①。在王锡爵担任内阁首辅期间,万历朝鲜战争正值第一阶段的援朝作战与第二阶段的对日议和之始,他在这一重要历史过程中有何作用?本文拟就明朝援救朝鲜决策、疏化朝鲜前线明军将帅二人之间矛盾、对日议和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对他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考察和讨论,以深化有关明代万历朝鲜战争史的研究,并补充《明史》相关书写之不足。

一、“东事”比“西事”更可忧

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集结十六万远征军,于四月进攻朝鲜。五月十日,朝鲜国王向明朝正式求援:“朝鲜国王咨称,倭船数百,直犯釜山,焚烧房屋,势甚猖獗。”^②一个月内,朝鲜的汉城、平壤、开城相继陷落,国王等人逃至中朝边界地义州。一时间,朝鲜“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请援之使络绎于道”^③。六月初二日,万历皇帝命辽东都司紧急发兵应援朝鲜,以保卫朝鲜国王安全。不料,祖承训所率三千明军在进攻平壤时遭日军伏击而失败^④。六月二十七日,以石星为尚书的兵部官员请求皇帝,“再遣知兵文武大臣各一员,统领蓟辽南北兵马,直抵朝鲜,存属国以固门庭”^⑤。而对于兵部派兵援救朝鲜保存属国的建议,万历皇帝下旨令府、部科道官员一起讨论。

万历二十年(1592),明朝同时面临两场战争。在日本进攻朝鲜的前两个月(二月),明朝边防系统“九边”之一的宁夏镇发生兵变,宁夏致仕副总兵哮拜与河套地区的蒙古反叛势力相勾结,杀害明朝巡抚都御史党馨、副使石继芳而据城(今银川)谋反,是为“哮拜之乱”。三月,朝廷令陕西三边总督魏学曾急调山西大同、宣府等地兵力平定“哮拜之乱”。四月,又派宁远伯李成梁前往宁夏总兵征剿。九月,哮拜在兵败后自缢。而明朝为平定哮拜之乱,用于调兵以及奖赏耗银上百万两,粮草、器械等投入也非常巨大^⑥。所以,明朝对于要不要援救朝鲜,同时应对两场战争,官员中意见不一。如兵科都给事中许弘纲提出:“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篱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请兵则赴援,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望风逃窜,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之乎?”^⑦在许弘纲看来,朝鲜君臣在日军入侵面前“望风逃窜”,朝廷要不要出兵?他特别担忧:“夫倭未弱于虏也,在虏则欲抚之大军之前,在倭则欲歼之累胜之后。倭重倭也,即虞内地不支;倭轻倭也,即欲立功异域,又臣等所大惑矣。”^⑧他认为日军未必弱于“北虏”,我们在对付“北虏”时尚且要考虑招抚之策,而要想完全歼灭日军则不现实。况且,又是在异域作战。而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也带来国力不支的问题。

①万历初期,首辅张居正的权力达到顶峰。王天有曾指出,张居正“以内阁控制六科,监督六部,就超出了内阁议政的权限,明显地把权力延伸到监督百官执行权的领域。”(王天有:《王天有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张居正死后,内阁权力即受到明神宗抑制,但“票拟”等权仍在,在明代君臣关系中仍发挥着沟通作用。

②《明神宗实录》卷248,万历二十年五月己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616页。

③《明史》卷320《朝鲜传》,第8292页。

④《明神宗实录》卷249,万历二十年六月庚寅,第4630-4631页;卷251,万历二十年八月壬辰,第4674页。

⑤《明神宗实录》卷249,万历二十年六月乙卯,第4644页。

⑥路虹:《明代宁夏镇“哮拜之乱”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⑦《明神宗实录》卷250,万历二十年七月庚申,第4649页。

⑧《明神宗实录》卷250,万历二十年七月庚申,4649页。

此年三月,明朝内阁大学士王家屏为促使皇帝早立储君而辞职归乡,内阁中仅剩赵志皋、张位二人。万历皇帝立即下旨任命在家省亲的大学士王锡爵为首辅,并令他速回京师赴任:“卿疏终养,屡旨慰留,只为国家多事,边鄙未宁,资卿忠猷,共图匡济。方今叛贼勾虏,势颇猖獗,卿岂得坐视不顾?又闻卿母痊可,何不为朕一出?待事定之后,归养未迟。着行人何崇业敦促就道,以付眷怀。”^① 据此而知,万历皇帝催促王锡爵来京的主要动机,是处理北边边防问题,旨中“方今叛贼勾虏,势颇猖獗”,即指哱拜勾结蒙古势力叛乱。而对于已经发生的日本侵略朝鲜战争,从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对前来求援的朝鲜使臣回答中可窥其因:“皇上亦怜尔国,而宁夏方用兵,以此恐力分耳。”^② 就是说,皇帝在宁夏用兵之时,不敢做分力增援朝鲜的计划。对此,王锡爵认为宁夏用兵的“西事”,皇帝不必担心。他在七月九日上奏的《中途辞召命疏》中说:“即今皇上所忧在西事,而以臣局外观之,彼乌合叛众死守一城,饵虏之财与格战之技必将自尽,而见在二、三边吏亦或自能办。”^③ 即认为哱拜叛乱只是乌合之众,困守一城很快即能剿灭。而“朝廷一面防虏,又一面防倭,一面防军,又一面防民,征徭不休,旋生得失,此则望皇上留神宵旰,日召二三大臣谋之”^④。王锡爵疏请皇帝留神,“防虏”之时更应“防倭”,用兵之时既要防止兵变,也要防止因军事行动加重百姓徭役而出现“民变”。

与此同时,王锡爵考虑到援救朝鲜比平定哱拜的问题更为重要和紧迫,于是专门致信两位内阁同僚赵志皋与张位,请他们劝请皇帝重视援救朝鲜问题。他在给赵志皋的信中说:“上意专忧宁夏,旨中既及,则不肖不敢无一言以对……彼区内援之虏,与外勾之贼,非久必将自离,料无足为宵旰大忧,本兵不必过为忙扰,自乱着数。”^⑤ 他与赵志皋所谈宁夏用兵一事,与他上疏万历皇帝的主旨相同,应是协调君臣意见统一。而他在给张位的信中,则明确指出:“观□(圣)意专忧西事,以愚而虑,东贼更可忧兹。”^⑥ 由此可以看出,他希望张位向皇帝表达出“东事”(援救朝鲜)比“西事”(用兵平定哱拜叛乱)更重要。至于“东事”为何更可忧,限于王锡爵给张位的信极为简略不得而知。而从王锡爵疏中所保留的皇帝御旨来看,万历皇帝也接受了谋划“东事”的重要性。他在给王锡爵旨中称:“东西寇贼鸱张,正藉讪谟指授。卿可单车就道,为国筹边,以副朕怀。”^⑦ 可见皇帝御旨已将“东事”与“西事”并列,说明王锡爵的建言起到了作用,皇帝也期待王锡爵速来京师筹划国防大事。

七月十六日,兵部官员提出:“朝鲜倘陷,螫必中辽。则固我藩篱,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者。”^⑧ 兵部将援救朝鲜与辽东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七月十九日,内阁大学士张位上奏:“况今虏警倭防,桑土绸缪尤亟。臣以为近京周围十里宜卜水土要害,特建辅城四座,以卫京师,每城置兵万人,内设营房,外设教场,照常操练,声势犄角,猝有外患,城门可开。”^⑨ 张位奏中虽没有向皇帝明确提

①(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38《中途辞召命疏》,集部第8册,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②[韩]朴东亮:《寄斋史草》下,《壬辰日录三》,《大东野乘》九,释尾春弼主编:《朝鲜群书大系》第12辑,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版,第288页。

③(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38《中途辞召命疏》,集部第8册,第106页。

④(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38《中途辞召命疏》,集部第8册,第106页。

⑤(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3《赵浚阳相公》,集部第7册,第517页。

⑥(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3《张洪阳相公》,集部第7册,第516页。

⑦(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38《中途辞召命疏》,集部第8册,第107页。

⑧《明神宗实录》卷250,万历二十年七月癸酉,第4660页。

⑨《明神宗实录》卷250,万历二十年七月丙子,第4661页。

出增兵援救朝鲜之事,但却把日军侵犯朝鲜对京师安全构成威胁联系起来。赵志皋则是“窃愿皇上亟召锡爵赴京,共图国事”^①。而王锡爵居家与皇帝以及阁僚就处置“西事”与“东事”进行疏信互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皇帝关于增兵援救朝鲜的决策。七月二十六日,“上念朝鲜被陷,国王请兵甚急,既经会议,宜速救援,无貽他日边疆患”^②。八月十八日,万历皇帝敕令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前往蓟、辽、保定、山东等处,经略海防御倭军务;十月十六日,朝廷决定调回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李如松,担任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军务,并任防海御倭总兵官,以统兵援救朝鲜^③。于此而观,王锡爵认为“东事”比“西事”更可忧的意见,通过留守阁僚的建言,尤其是兵部尚书石星的努力^④,终于转化成明朝举大兵援救朝鲜的决策。

二、保护将帅,疏导将帅之间矛盾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王锡爵抵达京师,朝鲜也传来明朝军队在平壤取得大捷的喜讯。然而,随后如何展开军事行动,明军在朝鲜前线最高军政指挥宋应昌和李如松之间,二人不和所传甚多。那么,远离前线的朝廷要员在了解远在异国指挥作战的明朝一文一武要员关系不和情况后,是如何疏导二人关系的呢?所幸,《王文肃公文集》中收录了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就援朝前线战事先后写给宋应昌、李如松以及经略赞画刘黄赏、主事袁黄等人的28封信件,从信件中可使我们了解到王锡爵作为明朝内阁首辅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所起的军政引导作用。

明军取得平壤大捷后,连下开城,提督李如松立即部署进攻朝鲜王京汉城(今韩国首尔)的行动。而尚在辽东凤凰城调度兵马、粮饷和火器的经略宋应昌,则两次去信进行阻止。他认为,日军在平壤战败后,“今各路者,总归王京,其势大合,且去爱州,道途千里,其为当慎,视前犹甚,必须俟我刍粮、军火、器械并集充裕,然后进剿,方为万全”^⑤。“如刍饷未至,不若暂守西岸,俟有次第,一鼓下之,何如?”^⑥不过,李如松未能接受宋应昌意见,明军在李如松指挥下乘胜南下,在朝鲜王京附近的碧蹄馆遭受日军围击而失利。本来,按照万历皇帝的授权,“经略关系重大,应昌忠勇任事,督抚官毋得阻挠,将领以下一听节制,违者以军法行”^⑦。然而,李如松作为武臣中首设的“提督”官,军权既重,又依恃自己在宁夏新立军功,不把经略宋应昌放在眼里。史书记载他俩初次见面,按明朝礼仪“大帅初见督师,甲冑庭谒,出易冠带,始加礼貌”。可是李如松却“用监司谒督抚仪,素服侧坐而已”^⑧。李如松对宋应昌的这种轻视态度,连朝鲜君臣在援朝之初即感觉到他俩的“不和协”。^⑨王锡爵最初则是借碧蹄馆之战失利之时专门写信告诫李如松:“我军天时地利未便,而贼据坚城,

①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第2册,“万历二十年五月九日戊辰”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1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250,万历二十年七月癸未,第4665页。

③参见《明神宗实录》卷251,万历二十年八月乙巳,第4681页;卷253,万历二十年十月壬寅,第4711页。

④石星力主援救朝鲜,参见孙卫国:《兵部尚书石星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第69-106页。

⑤(明)宋应昌撰;郑洁西,张颖点校:《经略复国要编》卷5《与平倭李提督书》(二十一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2页。

⑥(明)宋应昌撰;郑洁西,张颖点校:《经略复国要编》卷5《与李提督书》(二十五日),第154页。

⑦《明神宗实录》卷251,万历二十年八月壬子,第4685页。

⑧《明史》卷238《李如松传》,第6193页。

⑨《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卷33,宣祖二十五年十二月己酉条记载,“昆寿曰:‘大抵宋与李似不和协矣。’上曰:‘宋与李何不相得耶?’恒福曰:‘新立大功,且多气,必轻视侍郎矣。’”(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网站点校本: <http://sillok.history.go.kr/search/inspectionMonthList.do?id=kna>)

食积粟必无内薄登埤之理,是以明诏谕公等进止。今已烧贼积聚,则我得胜算矣。正宜聚器械、保资粮、抚循将士,时出奇以挠之,此坐而制敌之策,朝廷不责公以速战也。驻师异域,惟在行阵和睦,优劣得所,勿令麾下侵偏裨,勿令华人奴虏朝鲜吏士,是所望于大将者耳。”^①从信的内容可知,王锡爵明确批评李如松不听朝廷劝阻而在天时地利未便情况下贸然进攻王京的错误行为,但朝廷“不责公以速战”,要他“和睦”将士,严肃驻师异国的军纪。在得到李如松回复信件后,王锡爵又写信给李如松:“捷音再闻,因领手教,既仰贺公非常之功,又备悉公非常之苦。当二李将军溅血马前,公之安危,且间不容发矣。虽本天祚精忠,长城无恙,然自此或亦宜稍自慎重,全身即所以全军也,高明裁之。王京地险而贼众,在朝诸公业忧深入之非策。然矢脱于弦,岂可遂止。今已疾催李、刘二将前来策应,顾海外远征,其势不可多,增兵恐运饷不敷,反成自乱,此亦公之所宜虑也,冗迫草草。”^②由王锡爵的这封复信内容推测,李如松应是向他陈述了明军在碧蹄馆战斗中虽有失利但却取胜的情况,尤其是李如松本人虽受日军重围而其兄弟李如柏、李如梅分别率部及时围击日军,从而实现明军在战场上转危为安的局面。王锡爵则向李如松指出,作为统帅“全身”即是明军“全军”,主帅安危关系全军,“宜稍此慎重”;日军在朝鲜王京屯兵甚众,暂不宜突入;朝廷正在急调刘綎所部川兵入朝策应,但增兵太多又面临粮饷供应问题,希望李如松要考虑到增兵所带来的运输粮饷困难。

平壤战役取胜后,明朝本应及时对参战将士评定军功进行奖赏,以鼓舞士气。然而,明朝对此役叙功奖赏之事却拖延至第二年九月才予公布^③。这是由于李如松拟定的奖赏方案不公,以及宋应昌与李如松两方面势力矛盾和斗争造成的。最初,明军在攻打日军所占平壤城出现不利时,提督李如松即高呼“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吴惟忠所部南兵凭借火器远攻率先登城并立下头功,但李如松却在奏功疏中把攻城首功归于北兵将领张世爵,随即引起南兵将士的不满,朝鲜君臣也认为李如松贪功而对南兵极其不公。南兵将士在遭遇不公时多向同为浙江人的宋应昌报告,李如松认为宋应昌不知兵而全惑于南兵,宋应昌则以个人影响力来为南兵鸣不平,朝鲜甚至还流传宋应昌有弹劾李如松滥杀冒功的奏本,明朝朝廷也确实有派遣御史勘查此事的举动。因此,叙功之事一时难以进行。^④

首辅王锡爵认为平壤战役叙功问题不应操之过急。万历二十一年(1593)一月二十三日,宋应昌在向兵部尚书石星的报书中提出,请台下转恳内阁,对东征将士进行鼓励,“破格升赏”。二月十六日,宋应昌又在报王锡爵书中说,“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矣”。因此,“伏乞相公主张,允某所请,昨叙功小疏亟为题覆”^⑤。对于宋应昌请求叙功的主张,王锡爵在给宋应昌的信中示意他冷却论功之事:“海外之功,诚倍于宁夏。门下所为劳心焦思,而筹与将士之饮血暴骨,而争者诚不可以薄报。顾今宁功甫叙辽师未班,局傍妒眼尚热,似不如少待王京寇退而后论功尊疏,尚可及止否?”^⑥从信中“海外之功诚倍于宁夏”一句看,王锡爵希望宋应昌相信李如松。同时,他不希望在日军尚占据朝鲜王京的形势下,为将士争报军功。王锡爵作为深具政治经验的明朝高官,显然认识到延缓叙功工作,可以暂时避免援朝明军内部矛盾的进一步爆发。而李

①(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4《李提督》,集部第7册,第525页。

②(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4《李提督》,集部第7册,第526页。

③参见《明神宗实录》卷297,万历二十二年九月丙子朔,第5119-5120页。

④参见孙卫国:《李如松之东征及其后裔流寓朝鲜考》,《人文杂志》,2014年第1期;张金奎:《万历援朝战争初期的内部纷争——以赞画袁黄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2016年第5期。

⑤(明)宋应昌撰;郑洁西,张颖点校:《经略复国要编》卷5《报石司马书》(二十三日),第152-153页;卷6《报王相公书》(十六日),第180-181页。

⑥(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4《宋桐冈经略》,集部第7册,第527页。

如松也曾向王锡爵报信询问叙功问题,王锡爵则写信回复:“此中因见经略叙功不早,台中颇有异议,然非公之所宜置喙耳。”^①从信中看,李如松把朝廷迟迟不能叙功问题看成是宋应昌所为,王锡爵则明确告诉李如松叙功一事是由于御史官员意见不同,作为当事人不宜多问。显然,王锡爵这两封信都是借宋应昌和李如松二人询问平壤战役叙功问题,来劝导二人要相互信任。

后来,王锡爵还借了解朝鲜倭情机会,专门写信告诫李如松:倭据西生浦而要求册封和朝贡,“尚有要挟之状,慎毋轻许。大将在外,岂容日夜忧谗畏讥。经略累次书来,已欢然倾心于公,公但谨守便宜,和辑将士,准备全胜凯归,毋虑于后事已”^②。信中要求李如松在明日和谈期间,不要轻许日方要求。同时,王锡爵明确告诉李如松,宋应昌多次向他表达对李如松的倾心,希望李如松严谨处事,和睦将士,以备全胜归来。当李如松感受到御史周维翰疏报查勘东征情况的压力时,写信求助王锡爵。王锡爵回信表明内阁态度:“来教虽盛称周直指之忠,而此公报疏却尚牵中朝余论,不肖会当以己意规之,盖安公即所以安边也。”^③在王锡爵看来,李如松虽然认为周维翰忠实,但他的报疏中也涉及不同看法。他表示自己会以以往意见来处理此事,并向李如松强调:保护你即是安定边疆大事,明确地让李如松放心。为此,他还专门写信告诉周御史,近来论功之事,由于“李氏父子太盛,为人所忌,当抑而全之。至于外间汹汹,加以不可测之心,不可赦之。恶则实无形影,即如李如松近有报帖来,谆谆以早班师还乡为嘱”。他认为这些人皆是猜防李氏,“李氏亦无可口(恶)。天理人心,鬼神寤式临之,流言止于智者,不能无望于公乞,自此慎之”^④。显然,王锡爵是希望周维翰保护好李如松。同时,王锡爵也希望李如松不要屡提致仕回乡:“而累疏乞闲,恐亦属文吏画眉调舌之态,不如已也。幸一听鄙言,静待躁忍,待勇眼前,参商将化为和气矣。”^⑤就是说,他希望李如松不要像有的文人那样喋喋不休上疏求退,而要戒急戒躁,温和待人。

王锡爵在给宋应昌的书信中,更是强调二人要同心协力。如他在回复宋应昌关于倭情的信中说:“晋州中倭之说真矣,但愚意终以寇为穷计,未必有意得城,及更转掠而北也。教中分部兵马及计处转饷,皆中窃本兵移听尚州之说,不肖先不敢主张,止以就近商量为之。此正令,门下得自择便利,何所复疑,勉收大功,以塞谗口耳。李提督处,生恐言不能信,复托乃父以书切戒之。今喜得绛灌同心,何事不济?”^⑥从此信来看,宋应昌因与李如松共事的作风把握不定,曾专门致书给李如松父亲宁远伯李成梁,请李成梁规诫其子。王锡爵闻悉而非常高兴,认为只要“绛灌同心,何事不济?”显然,王锡爵借“绛灌同心”之典故,希望二人精诚合作,取得援朝御倭的最后胜利。同时,他对宋应昌也提出要排除朝中言官对于朝鲜倭情大事的干扰:“至于中朝梦语非止一端,烦语督抚公,大将在外,其身之不遑恤,何论是非矣。”^⑦言下之意,既然你宋应昌已投身疆场,身家性命都已不惜,言官的那些是非言论不必当回事。王锡爵还明确告诉宋应昌,自己看到“将士以力击贼于外,议论者以舌击任事之臣于内,仆诚不惜动气与争,幸得少定”^⑧。就是说,王锡爵对于言官不负责任的言论,也非常生气,所以曾与他们争论,所幸现在言官的失实言论有所好转。

①(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李提督》,集部第7册,第552页。

②(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李提督》,集部第7册,第560页。

③(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6《李提督》,集部第7册,第575页。

④(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周韬宇御史》,集部第7册,第557页。

⑤(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3《李仰城提督》,集部第7册,第501页。

⑥(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宋桐冈经略》,集部第7册,第551页。

⑦(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4《宋桐冈经略》,集部第7册,第527页。

⑧(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宋桐冈经略》,集部第7册,第556页。

在王锡爵致仕后,宋应昌和李如松二人所关心的平壤之役论功问题,也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七月周维翰提交勘覆意见后,认为“东征功次以平壤之胜,不可以为败;碧蹄之战败,不可以为胜。倭小首级真,不可以为假;倭之大首级假,不可以为真……经略、提督、赞画、督抚、部司、通判与事官员、留守兵将,均当一体勘叙,以昭国是,以励人心”。万历皇帝对此明确表示,“叙录升赏,不必再行查勘”^①。九月,兵部正式公布对宋应昌、李如松的东征功赏^②。

三、王锡爵与对日议和

明军在碧蹄馆之役受挫,宋应昌开始试探对日议和。“初,我师捷平壤,锋甚锐。转战开城,势如破竹。及碧蹄之败,久顿师绝域,气益索。因而封贡之议起。”^③所谓“封贡之议”,即是对日议和。据研究,明日军队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西路统帅小西行长写信给明朝沈惟敬^④,表示愿意和谈。于是,宋应昌正式启用沈惟敬对日和谈^⑤。在宋应昌看来,是借议和来使日本从朝鲜退兵。而兵部尚书石星更是主张采取战与和相互配合的策略^⑥,有学者勾勒出明朝对日议和的人事链条:赵志皋(阁臣)→石星(兵部尚书)→宋应昌(经略)→沈惟敬(和谈代表)^⑦。那么,作为当时内阁首辅的王锡爵对于明日议和的态度如何呢?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四月二十八日于病中上《谢宣谕疏》,向万历皇帝表示:“目前国事,莫急于倭、虏。倭若真心向化,决无绝理;若分外要求,决无许理。羈縻、驾馭,惟此两端而决者。其他盈庭之议,勇至欲岁糜百万之财,而怯不敢通一介之使,则非臣之所解……此处倭虏之大纲,即留臣经年,所守只此数语。”^⑧从“羈縻、驾馭”“岁糜百万之财,不敢通一介之使”等语可见,王锡爵是支持石星和宋应昌等人对日和谈的。

为何一位视“东事”可忧而坚定主张派兵援朝御倭的首辅,此时直接对万历皇帝讲明对日议和问题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王锡爵通过宋应昌等人报书了解到,天雨连绵,道路泥泞,军马困乏,粮草运艰,疫气流行,军士斗志已不足^⑨。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初,王锡爵指示李如松:“聚器械、保资粮、抚循将士,时出奇以挠之,此坐而制敌之策,朝廷不责公以速战也。”^⑩同时,他也告诉宋应昌:“我当续食相持以蔽之,不当急攻。”^⑪可见,王锡爵在此时仍是强调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没有对日和谈的打算。三月二十三日,我们却从宋应昌写的“报王相公书”中,发现有王锡爵“屡屡台旨‘倭奴连日有书与沈惟敬乞封,欲姑许之’”的字句。显然,王锡爵在得到日本人连日请求和谈

①《明神宗实录》卷275,万历二十二年七月辛巳,第5088-5089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277,万历二十二年九月丙子,第5119-5120页。

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2《援朝鲜》,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67页。

④沈惟敬(1537-1599),明朝浙江嘉兴人。因其家人沈嘉旺曾居住日本18年,沈惟敬得以了解日本国情,后攀援兵部尚书石星,成为万历朝鲜战争初期明朝对日本进行和谈的使臣。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沈惟敬单纯地想与日军小西行长和谈来结束战争,瞒着朝廷,企图实现“秀吉册封”,最终失败,被明廷处死。

⑤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期间和平条件的交涉及其变迁》,《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

⑥孙卫国:《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

⑦焦堃:《万历朝鲜之役中的和谈问题与明廷党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60-77页。

⑧(明)王锡爵:《文肃王公奏草》卷20《谢宣谕疏》,集部第135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78页。

⑨(明)宋应昌撰;郑洁西,张颖点校:《经略复国要编》卷6《报王相公书》(十六日),第180-181页。

⑩(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4《李提督》,集部第7册,第525页。

⑪(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4《宋桐冈经略》,集部第7册,第526页。

信息后,同意和谈(“姑许之”)。宋应昌迅速回复:“兹者复领尊教,鄙意遂决。”^①即把对日和谈正式作为解决“东事”的手段。由此可见,首辅王锡爵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中下旬左右采纳了战与和相互配合的解决东事策略。

因此,宋应昌在四月初一通知管粮主事艾维新有关于朝廷处理“东事”的新动向:“近日朝中议者,俱谓不宜深入。昨平壤数战已足示威。兹倭奴卑词乞哀,纵未必真否,而我假此纵归,朝鲜故土不失尺寸,天朝兵马可以速还,钱粮可以减省。”宋应昌认为,若是通过和谈促使日本撤军,我们正可节省钱粮。不过,宋应昌也担心朝鲜国王反对明日和谈:“今彼国王徒欲报怨而不修省,徒欲中国烦师而不知兵连祸结反贻伊国之害。”^②五月初六日,宋应昌向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和兵部尚书石星报告,幸得日军“势屈求归”,我方可“借言通贡,正可为调虎离山之计”^③。在宋应昌的和谈工作汇报中,不仅包含日本从朝鲜撤军的内容,还有日本与明朝通贡的条件。对此,王锡爵告诉宋应昌,明确“三不许”原则:“东师事三言蔽之:以兵挟贡必不许;即不挟而兵尚屯釜山,必不许;即釜山屯散而求以辽阳为贡道,亦不许。”^④而且,他还提醒宋应昌,对日议和也不能仅靠沈惟敬这一渠道:“今用间不广,而专恃一沈惟敬以通血脉,此外惟以力搏力耳,愚未见其全利也。”^⑤王锡爵明确指出不能相信沈惟敬的一面之词,同时要有军事斗争准备。六月初一日,宋应昌即复书王锡爵:“五月三十日接相公手札……款贡一事,原非某之本心,只以倭集王京,其数甚众,且城中寨栅坚牢,城外布营联络,欲进剿则我兵疲弱,道路险峻,欲坐困则时日耽延,莫知究竟,姑尔许之。”^⑥宋应昌即称“款贡”(准许日本朝贡)并非他的本心,只是姑许,以应对朝鲜王城日兵强众的不利局面。不过,王锡爵还是有些担心,他又通知李如松不可与日本通贡:“乃不佞所忧,在通贡一节,悠悠之谈,恐又将因此生议一者,背祖训二者。启后忧似不如,姑以言款之,而密以计阻之,使之日远日疏庶为长策耳。”^⑦显然,他之所以致信李如松,是希望他在前线指挥部帮助阻止沈惟敬等人允许日本通贡。王锡爵还明确告诉御史官,“东征一说,封贡必当尽绝”^⑧。另外,他也致信总兵官杜松,朝廷对于日本的态度是:“驱之出境为实,而延之入贡为虚。公试观结局,则知庙堂微意之所在矣。”^⑨这也表达了王锡爵对于明日议和的基本原则。

基于这一原则,王锡爵与宋应昌、经略赞画刘黄裳等人还就明日和谈期间的敌方情报搜集与及时传递、明军驻防以及撤出部分援军的可能性、粮饷供应与在朝鲜是否可以屯田等问题,一一进行书信询问。如王锡爵问宋应昌:“得报倭急攻全罗,残破之虏其气愈壮,其入愈深,将以何为?虽军书络绎而尚未悉其要领,曾与接办否?贼疲困久矣,月余以来,尽仰食于剽掠乎?抑关白远馈之粮也?提督而下意气何如?不复忧衣食否?此皆所急欲闻者。”“此外惟奏报如期,明注时日,以息众疑,诸不一一。”“又劲敌相持,已成持久之局。向所云朝鲜银矿可开否?彼处腹里地方有水草,可屯田否?”“使贼粮不继,我气未复,则门下所谓扼守要害,俟其粮绝邀而取之,固是胜策,请勿复

①(明)宋应昌撰;郑洁西,张颖点校:《经略复国要编》卷7《报王相公书》(二十三日),第226页。

②(明)宋应昌撰;郑洁西,张颖点校:《经略复国要编》卷8《与艾主事书》(四月初一日),第231页。

③(明)宋应昌撰;郑洁西,张颖点校:《经略复国要编》卷8《报赵张二政府并石司马书》(初六日),第247页。

④(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宋桐冈经略》,集部第7册,第556页。

⑤(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宋桐冈经略》,集部第7册,第552页。

⑥(明)宋应昌撰;郑洁西,张颖点校:《经略复国要编》卷9《覆王相公书》(六月初一日),第268页。

⑦(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李提督》,集部第7册,第557页。

⑧(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6《柳廉虞御史》,集部第7册,第575页。

⑨(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杜总兵》,集部第7册,第556页。

疑。”^①“朝鲜阨狭，可以制贼者，宜在鸟岭……抑不知屯□(田)积谷，将使戍士任之，或责之朝鲜臣民自任也。留兵一万六千人，经略所规军食之费，则中国当六之五而朝鲜供一焉，借兵以自卫者，如此无乃非人情乎？今户、兵之藏，俱告匮矣。又增岁费七八十万，岂可不深计哉！东国虽当残破之余，未有数千里内不能供二万人食者也。若云彼国自当养兵，而兵不足用，何不减去老弱，以奉中国战士乎？又不然彼之君臣，言及亡国辄涕泗横流，此勾践栖于会稽之时也，岂不能节衣缩食以救危亡乎？前闻其国诸矿可采，后复报罢，岂虑我之求，多不欲开端也，愿足下更详问之。”^②

王锡爵在对朝鲜情况进行一番了解后，后来却向宋应昌征询从朝鲜撤军的可能：“朝鲜地形真我东北，数千里垣墉。留兵之说，诚封疆至计。至于不佞之意，则异于此。盖以将士久住外国，恩不施则士气自消，威不振则如骄子不可用，朝廷无所寄其耳目，则三军之苦乐不得上闻，一也。我军自负其代朝鲜以受敌，必以俘虏侵役之，彼不能堪，反忘其大计，而乐吾之祸败，两相猜忌，何事不生？二也。彼军怯而善走，倘倭奴复至，必推我以为先锋。主人先奔，客自沮溃，更加众寡不敌。樵苏后时，悬军无继，大可忧□，三也。至于内帑岁增，出六七十万金，盖其小□者矣。是以颇主撤兵之议，使彼君臣知亡之无日，苟自为谋耳。门下以为何如？”^③从王锡爵提出的三条撤军理由来看，第一条是从明军长期驻扎异国的不利因素考虑的，而第二条认为朝鲜对于明朝援助猜忌生事，第三条认为朝鲜军队遇敌先溃。显然，他的撤军主张是从情感因素而说的，他本人也承认在朝鲜“留兵之说，诚封疆至计”。事实上，他的这一意见也没有成为东事决策，明朝仍是保留刘綎等部驻守朝鲜。不过，此时[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已因上奏官员考核而引发的政治斗争致仕回乡。

四、余论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侵略朝鲜之初，万历皇帝就任命休假在乡侍亲的王锡爵担任内阁首辅，而王锡爵也不负万历皇帝所托，伊始就提出了“东事”比“西事”更可忧的问题，认为日军侵略朝鲜事关辽东以及北方沿海地区和京师的安全，从而促成明朝派兵援朝御倭的决策。在援朝过程中，王锡爵还发现处理“东事”比“西事”更难。他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为刚去世的宋应昌所撰写的“神道碑文”中，对此做了具体阐述：“曩公(按：指宋应昌)受命时，子适在政府，每叹公经略外夷，与边臣不同，边有坚城可凭，而海则与倭共之，无处不犯，则无处不瑕，难一；他镇调兵，必先主孤，后客老弱居半，道路迂延，难二；边臣伸缩自由，而经略则空名客寄，俯仰随人，难三；羽书以风为迟速，语言以译为往来，难四；朝鲜利于留兵，不利罢兵，倭来则贷手报仇，倭去则张小为大，饰缓为急，难五；李氏盛满，人心不附，而又立万金之赏，悬封拜之格，忌宁远者并以忌公，难六。呜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西湖绝口不谈东事也。”^④上述六难，既道出了宋应昌受命援朝抗倭履职的尴尬，也阐述了王锡爵认为“东事”比“西事”更可忧之处。从“东事”更忧到处理更难，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深刻而又简要的关于周边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历史总结。

王锡爵以内阁首辅身份屡屡与身在援朝御倭前线指挥部的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等人通信，以了解异国战场情况，并针对宋应昌与李如松二人关系不和的情况，极力进行疏导，用心培植

①(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宋桐冈经略》，集部第7册，第551页。

②(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刘太景赞画》，集部第7册，第559页。

③(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25《宋桐冈经略》，集部第7册，第556-557页。

④(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6《经略朝鲜薊辽保定山东等处军务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冈宋公神道碑》，集部第7册，第166页。

二人的信任感。王锡爵与李如松原本没有私人关系,但为了朝鲜战争大局,他一直对其他文臣强调要对李如松予以保护;而他给李如松本人的信件里,在肯定中又不乏指出其处事不周问题,既饱含着人文情怀,又反映出他作为首辅的使命担当和为国尽责。

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中下旬同意对日议和,采纳了石星和宋应昌等人关于战与和相互配合的东事行动路线。不过,他明确反对接受日本入贡的主张,并对军方人士表示要坚持将日军驱逐出朝鲜,对宋应昌等前线主官则强调议和期间的日军情报搜集、明军的布防和筹集粮饷措施。然而,作为一位有着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也不免受到情感因素影响,当他发现朝鲜方面的猜忌和无能情况后,甚至提出了完全从朝鲜撤军的意见。他对援救朝鲜态度的变化,除了上述情感因素外,也有对内的担忧:“先时各边止有年例,今加以宁夏、朝鲜之变,例外费过三百万,内帑耗竭,势不能无米而炊。”^①而在河南等地发生大面积水灾的情况下,更是担心民生因饥荒而生变。他不仅带头捐出俸禄赈灾,同时也向万历皇帝上疏赈灾^②。

王锡爵因明朝内部各派政治斗争激烈而致仕,使万历皇帝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辅政,也使明朝部署对日议谈受到影响。《万历邸钞》的作者曾对前任首辅王锡爵和后任首辅赵志皋做过比较:“辅臣王锡爵未去,兵部屡奉明旨,敕令倭众尽归而议款,又云岂有留兵近地,未见输真情即可轻许之理?及赵志皋滥竽元辅,该部节奉明旨,一则曰便差姚洪、陈云鸿前去,押送小西飞来京;一则曰沈惟敬催他星夜前去,李宗城等责令速往,致令二使深入倭营,进退维谷。”^③而清朝官修《明史·王锡爵传》中对于传主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和作用只字未提,笔者认为,《明史》纂修者对万历朝鲜战争的历史书写,“存在着只关注武功,而轻视谋划与战略的写史倾向”^④。

[责任编辑:马晓雪]

①(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48《劝请赈济疏》,集部第8册,第273页。

②(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48《劝请赈济疏》,集部第8册,第274页。

③《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三月卷,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951-952页。

④陈尚胜:《万历朝鲜之役关键性人物与〈明史〉相关记载》,李庆新主编:《学海扬帆一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8页。